



## 霸凌問題的社會學分析：日本與臺灣的比較研究

劉國兆

### 摘要

在日本及臺灣，霸凌（bullying）問題在媒體報導及社會大眾的關注下，迅速成為政府優先處理的重要議題。為瞭解霸凌問題處理模式的異同處，本研究以日本及臺灣作為比較研究的對象，透過文獻的比較研究及社會學（sociology）觀點的分析，深入瞭解日本及臺灣霸凌問題的社會文化脈絡及其意涵。研究發現，在日本高度競爭並講求紀律的社會文化中，遵守團體規範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生存價值，然而面對政經環境的劇烈改變，社會一再出現失序的現象，加上校園內競爭激烈的考試壓力所引發師生集體霸凌的助長下，學生的霸凌問題不斷浮現，並以自殺事件作為引信，將此問題引爆開來；而臺灣在政治對立、貧富差距擴大、價值觀扭曲的社會環境中，原本的威權體制已受到解構與挑戰，然而威權的思想及科層（bureaucracy）的文化，仍宰制著升學導向的校園，而學生面對父權體制（Paternalism）結構的束縛，其偏差行為及霸凌行為也就接連發生。由此看來，無論是日本或臺灣的學生，在社會結構壓制下所呈現出的霸凌行為，其實是具有行動主體深層的行為意涵，故處理霸凌問題必須兼顧不同

層次的思考，方能尋求整全性的解決方法。本研究未並提出建議，以作為政府、媒體、學校及教師處理此問題之參考。

**關鍵詞：**社會學分析、偏差行爲、霸凌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November, 2015, No. 79, pp. 59-95  
DOI 10.3966/160957582015110079003

##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Bullying in Japan and Taiwan

Kuo-Chao Liu

### Abstract

Recently, bullying has surfaced as a governmental priority issue because of media coverage and public concern in both Japan and Taiwan. This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Japanese and Taiwanese methods of response to bullying approaches the topic through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existing document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contexts and meanings of bullying in the Japanese and Taiwanese societies,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the severely competitive and discipline-oriented Japanese society, adherence to majority-approved norms is the first rule of survival. However, as drastic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take place, disorder appears in society. Exacerbated by the teacher-condoned collective bullying caused by campus-wide pressure for high academic performance, bullying becomes increasingly common, bursting onto the public consciousness with resultant suicides. In Taiwan,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political oppositions, widening divide between rich and poor, and increasingly distorted values, while the original authoritarian system has been challenged, authoritarian ideas still dictate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oriented campus. Constrained by the patriarchal

---

Kuo-Chao Liu, Principal, Taipei Municipal Qingjiang Elementary School, E-mail:  
kuochao0374@gmail.com  
Manuscript received: Apr. 7, 2015; Accepted: Jul. 31, 2015

system, the students respond with deviant behavior and bullying. Seen in this light, whether in Japan or Taiwan, the bullying behavior surfacing under systemized social repression harbors a deeper meaning, and so the issue must be dealt with on multiple levels in order to reach a comprehensive solu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by bringing forth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media, school and educators.

**Keywords:** sociological analysis, deviant behavior, bullying

## 壹、前言

在臺灣，「霸凌」(bullying) 這個詞的出現，是在民間團體所公布的《國小兒童校園霸凌 (bully) 現象調查報告》中，“bully”被翻譯成「霸凌」而沿用至今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4)，不過因“bully”的原意指欺負人的惡霸，為表示欺負人的現象或事情，才改為“bullying”。在日本，“bullying”被認為是一種欺凌，與臺灣一般所指的「霸凌」有所不同。日本對於欺凌的定義採取從受害者認知立場的解釋，認為欺凌是學生受到心理或物理方式的攻擊，以致在精神上產生莫大的痛楚。而臺灣教育部所編訂的國語辭典裡並無「霸凌」一詞 (教育部，2011b)，現今採用的霸凌定義是經過教育部開會商議，並參考挪威學者D. Olweus對霸凌的定義後，將校園霸凌定義為具有欺侮行為、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造成生理或心理的傷害、雙方勢力 (地位) 不對等四項要件 (教育部，2011c)。然而，「霸」有「強橫無理」之意，而「凌」則有「欺侮、侵犯」之意 (教育部，2011b)，故臺灣採用的霸凌定義較為強調加害人人格及惡行的意圖。

然而，在霸凌事件的背後潛藏著不少複雜因素。在臺灣及日本，雖然媒體對於霸凌新聞都極感興趣，也不斷予以追蹤報導，但是在臺灣，霸凌事件會受到新聞綜藝化與戲劇化的影響而逐漸失焦，社會大眾易隨著媒體而起舞，且新聞熱度維持得並不久；反觀日本，媒體不僅長期關注霸凌事件，甚至持續批評政府的處理，形成一連串的專題報導。

為瞭解霸凌問題處理模式的異同處，本研究以日本及臺灣作為比較研究的對象，一來是考量日本及臺灣的地理位置、國情及文化脈絡較為接近，二來則是日本對於霸凌問題的處理已有20多年的經驗，或許有值得臺灣借鏡之處。故本研究透過文獻及文件的比較研究與社會學 (sociology) 觀點的分析，深入瞭解日本及臺灣霸凌問題的社會文化脈絡及其意涵，並提出建議以供後續研究者參考。

## 貳、社會學觀點的分析架構：理論與研究取向探討

社會學是研究人與社會相互影響的一門學問，由於社會學的研究範圍極廣，涉及的主題極多，加上全球化思潮的影響下，各種新式的理論、方法論與議題亦納入社會學的研究範圍中，故社會學已成為一包涵各種社會現象、架構各種社會制度、探討各種社會議題、運用各種理論研究的複雜學科（Elliott, 2010）。至於本研究採用社會學的理論與研究取向的主要用意，是希望從社會學的理論視角，運用合適的研究方法，以作為探討日本及臺灣霸凌問題的分析架構。

在社會學理論與研究的不同取向中，大致可從三個不同層次加以探討。第一個是巨型的層次，自A. Comte建立實證社會學（positive sociology）的方法論以來，就將科學研究程序及方法應用在社會中的任何現象與事物，故研究者可以客觀中立的態度，運用精確的數據，透過嚴謹的程序掌握社會秩序並進行社會改革（黃瑞祺，1996）。而後繼者E. Durkheim則從鉅觀的視角，研究人所構成的社會或集體行為，並從正面的角度去描述社會狀態，其關注的焦點是系統、整合、穩定與共識；另一個也是從鉅觀的視角，但卻從反向的角度來觀察社會的權力衝突和資源分配不均現象的是K. Marx與M. Weber，其關注的焦點則是矛盾、多元、衝突與對立（蔡文輝，2000；譚光鼎，2010；Mouzelis, 1991; Ray, 2010: 26-29）。前述理論與研究取向偏向於「結構論」，而順著「結構論」的觀點來看，社會結構會決定個體的獨立行動並限制個體自由選擇的能力，行動者幾乎無翻身之能力（葉啓政，2000；Mouzelis, 1991）。

第二個是微型的層次，是由Weber所建立的解釋社會學（interpretive sociology）方法論，重視的是行動者在日常社會生活中看待生活世界的觀點，故研究者可以根據行動者的主觀意義來界定及解釋社會現象，並深入

瞭解行動者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等 (Giddens, Duneier, Applebaum, & Carr, 2009)。後繼者如G. H. Mead等人，皆從微觀的視角，研究社會中的人及其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與意義的理解，並主張社會真實 (social reality) 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是人與環境互動協商的結果，故將研究焦點鎖定在真實生活中的人如何建構其理解世界的觀點 (Manning & Smith, 2010)。前述理論與研究取向偏向於「行動論」，而順著「行動論」的觀點來看，個體能運用其智慧及行動來回應結構的制約，甚至展現改變結構的能動性，在此論點中，結構似乎失去任何作用 (葉啓政，2000；譚光鼎，2010；Mouzelis, 1991)。

第三個是中型的層次，主要是J. Habermas等人所發展出來的批判社會學 (critical sociology) 方法論，批判社會學對於實證社會學與解釋社會學兩者都提出了批判，批判社會學認為實證社會學視科學為一切知識的標準，過於強調科學主義 (Scientism) 的絕對性，反而讓哲學成為科學的附庸，忽略了人身為主體的能動性與反思的行動力量 (楊深坑，1997)。另外，批判社會學亦認為解釋社會學所謂的「意義的理解」，只從行動者的立場來瞭解社會世界及行動的意義，過於強調個人的主觀意識，易淪為某種意識型態的反映 (張源泉，2006)；不過，批判社會學並不反對實證社會學的「因果分析」及解釋社會學的「意義理解」兩種研究途徑，反而希望兼採二者，讓兩種研究途徑相互批判，並從中超越，故其不僅重視行動者微觀意識的分析，更重視社會結構鉅觀層面問題的探討，在兩者交互辯證下，期能獲得對社會真實正確的認識。因此，主張批判取向的研究者，既重視行動者微觀意識的分析，更重視社會結構鉅觀層面問題的探討 (葉啓政，2000)。為調和上述二元的發展，Giddens (1984, 1996) 提出「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他認為結構既影響社會行動，也會在社會行動中獲得再製，兩者是相互生成的；Willis (1977) 則提出「抗拒理論」(resistance theory)，他認為個體在結構的壓迫下，會「洞察」(insight) 到結構的不合理，並採取抗拒的作為；Bourdieu (1990: 54) 運用「習性」(habitus) 這個概念來展示實踐是如何從社會中建構出來

的，同時又怎樣建構社會。

在前述三個不同層次的社會學理論與研究取向中，本研究採用中型層次的分析架構。一來，霸凌問題是社會結構制度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的產物，再者，霸凌行為也不光只是學生反社會的暴力或偏差行為而已，其行動往往帶有更深層的社會文化意涵，故為了理清霸凌問題的全貌，必須將霸凌問題放置在社會結構、行動主體、結構與主體交會等不同層面加以探討，並藉由相互的批判、辯證與超越，呈現出霸凌問題的多維度特性。故本研究將以圖1之分析架構為基礎，除採取批判取向方法論作為立論基礎以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的工作外，同時運用相關理論，分別從鉅觀層面探討日本及臺灣霸凌問題產生的社會結構因素、從微觀層面去理解霸凌事件中相關行動者的行為意涵，進而以批判反省的方法將前述二者放置在學校場域中加以辯證及融合，以檢視社會結構與行動主體兩者交會下所形成的文化產物，並從不同層面比較與分析日本及臺灣霸凌問題的相關資料，以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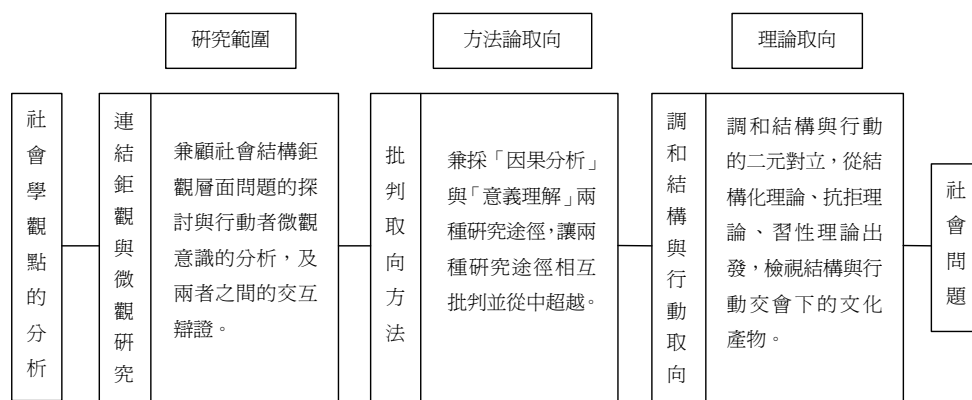


圖 1 社會學觀點的理論與研究取向之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譚光鼎（2010：13）。



## 參、日本與臺灣霸凌問題的社會學分析

霸凌問題的成因與性質頗為複雜，除發生原因包括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等多種因素外，霸凌事件的類型與涉入角色更呈現出多元且動態的樣貌，故研究者採取不同觀點加以探討，就會產生不同的分析結果（Olweus, 2001; Rigby, 1996）。從哲學觀點出發，可以瞭解霸凌行為所反映出的人性本質、價值觀等問題（Jacobson, 2010）；從心理學觀點出發，可以分析霸凌者身心健康與霸凌行為之間的關聯因素（顏正芳，2010）；從犯罪學觀點出發，則可以探討霸凌者的犯罪意圖及如何對被害人施以霸凌行為的理性選擇過程（陳怡儒、鄭瑞隆、陳慈幸，2010）。本研究從社會學觀點出發，除了從社會結構、行動主體及其兩者交互辯證等不同層面探討其與社會學相關之因素外，並深入分析霸凌問題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及其意涵。

### 一、日本

日本霸凌問題的浮現是在1980年代的中期，當時發生了一連串的學生自殺事件，經過報紙及電視臺的大幅報導，引起了社會大眾的關注，而日本學者也相繼投入霸凌的研究工作（Naito & Gielen, 2005）。以下將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日本霸凌問題的出現及其與社會學相關之因素。

#### （一）社會結構因素探討

##### 1. 以「日本第一」為追求目標的社會文化

日本是一個高度追求現代化的國家，不僅發展目標明確，且始終以英、美等國為效法及超越的目標。在全體人民的努力下，日本不僅已躋身先進國家之列，且位居世界八大工業國之一，日本人更給其他國家勤奮、有禮貌、工作認真投入、對公司忠誠、教育水準高、有效率、低犯罪率等良好印象，一時之間，「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的口號喊得震

天價響，世界各國無不派人到日本取經，以作為其經濟發展之參考。然而，就在日本還沉浸在「日本第一」的驕傲與喜悅時，「泡沫經濟」旋即到來，並重重地給了日本一擊，日本陷入經濟衰退的艱困期，企業倒閉、人民失業，連井然有序的社會也開始出現紊亂的情況：自殺、暴力、殺人等駭人聽聞的事件接連不斷發生，加上社會價值觀混亂、政治風暴不斷、人民對政府失去信任、地震接二連三發生造成嚴重傷亡等（The Japan Times Online, 2010a），這林林總總的事件凸顯出日本看似光鮮亮麗外表下的諸多問題。

首先，日本高教育水準的背後，是無數學生經過激烈競爭，並通過層層嚴格關卡篩選的結果，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下，學生受到的挫折與壓力之大可以想像，而學生的憤怒與不滿需要尋找宣洩的出口（The Japan Times Online, 2007c）；再者，員工雖然對公司忠誠並認真投入工作，但也投入極大部分的時間在工作上，造成許許多多的父親整日忙於工作，忽略了親子教養的活動（Naito & Gielen, 2005）；接著，為了高效率的產出及表現，必須以層層節制及紀律嚴明的科層體制（bureaucracy）加以管理，於是「服從」及「遵守團體規定」就成為最高指導原則，不論是在職場、在學校，甚至在家庭都必須遵守，這種不管命令及規定合理與否都必須「服從」的文化，並無法隨著時代變革而向前推移，當然也是造成日本衝突不斷的主因（Shimizu, 2000）；最後，日本的文化要求人民高度自制與絕對負責，甚至認為「自殺」也是一種負責任的方式，然而，失業及高度競爭的壓力常讓人喘不過氣來，但日本人仍要表現得謙恭有禮，並把諸多情緒隱藏起來，難怪一旦被引爆後反而釀成大災禍。據統計，日本有將近一百萬個年輕人為了躲避壓力，乾脆選擇「隱身」在家裡足不出戶，整日泡在線上遊戲及網路世界中，以逃避作為抗議的手段（Borovoy, 2008; Ozawade, 2008）。

於是，在追求「日本第一」的表相下，一股股對現狀不滿、對未來不具信心、對自己覺得失望等諸多顯而易見及隱身其中的衝突力量，在看似綿密完整的結構下翻滾衝撞，伺機展現其行動者的動能。如同Marx

(1976) 在《資本論》(*Das Kapital*) 中所預言：在資本主義 (Capitalism) 結構性的矛盾下，人民會爆發出一股股自發性的抗爭力量。

## 2. 學生自殺事件與媒體報導所呈現出的社會結構問題

對向來慣以「社會中心主義」為思考與行為模式的日本社會來說，1984年一連發生的十多起學生自殺事件，對日本社會造成極大的衝擊與震撼，而節節高升的自殺率，更讓日本擁有「自殺國」(suicide nation) 的稱號 (Ozawa-de, 2008; Shimizu, 2000)。

Durkheim在《自殺論》(*Le Suicide*) 一書中提到，自殺行為不能單獨以個人因素或個人動機來解釋，人是社會的動物，社群的性質，不僅決定了個人自殺的類型，亦決定了個人自殺的動機。Durkheim認為在變遷迅速的工業化國家及經濟蕭條的不穩定時代，社會整合力量降低，導致個人對團體的疏離，便容易產生脫序型 (anomic) 的自殺行為 (馮韻文譯，2008)。從Durkheim的觀點來看，隱藏在這些學生自殺事件的背後，正是日本長久以來存在的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就是造成學生自殺的主要原因。

在發生了一連串的學生自殺事件後，日本政府開始警覺到問題的嚴重性，1985年及1986年時，日本首相在對國會的演講中分別提到解決學校霸凌此問題的重要，至此，大多數的學校已將霸凌列為優先處理的議題之一 (Morita, Soeda, Soeda, & Taki, 1999)，而媒體正是促使政府正視此一問題的推手。1986年，日本各大報紙及廣受歡迎的電視節目皆開闢單元探討9位分別受到學校集體霸凌的學生的自殺原因，透過這些媒體的報導，社會大眾因而彷彿看到了自殺學生在生前那種極度痛苦的哭泣與呼喊的模樣 (Morita et al., 1999; Naito & Gielen, 2005)。

雖然有一度媒體不再關注霸凌問題，甚至日本政府還對外宣稱校園霸凌事件從1985~1987年起已大幅減少，1993年，學生自殺事件又再度引起媒體的注意及報導。1994年發生了一起13歲男學生遭受「哥兒們」長達兩年之久的霸凌而自殺的事件，經過報導後，震撼了整個日本社會：男學生

被哥兒們威脅給予大量金錢，若不從則被施以踢打或臉被壓入河水中等暴行，男學生總共給了他們美金8,000元；弔詭的是，男學生的父親發現有異狀時，男學生卻不聽父親的勸告，選擇繼續依附在這種關係中（Eslea et al., 2004; Morita et al., 1999）。再以1999年3月～2006年10月期間所發生的41起學生自殺事件為例，在受到父母投訴、媒體追蹤報導、國會審議等多重壓力下，文部科學省（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部長要求重啓調查，其中有14起被證實與霸凌有關（The Japan Times Online, 2007a）。

由前述分析可以發現，霸凌問題在日本媒體窮追猛打、緊迫盯人下，讓政府不敢輕忽此一問題的後續處理工作，由此可見媒體所扮演的不僅僅是監督及批判者的角色，還可以藉由深入的報導，進一步引領社會大眾去探討霸凌問題背後的複雜因素（Naito & Gielen, 2005）。

最令人訝異的是，日本校園的霸凌問題已形成一個彼此依附的共生結構，其中更夾雜著霸凌與友誼、同儕關係、團體中的權威與服從等交互影響的因素，日本社會發現，這不單是欺負、恐嚇、毆打等青少年偏差行爲的問題，已成爲複雜難解的社會問題（Eslea et al., 2004; Morita et al., 1999）。

由此看來，霸凌事件與日本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素息息相關，媒體則在其中發揮催化劑的重要作用。因此日本以“*Ijime*”這個日文發音的詞（類似於“bullying”）來代表霸凌，顯示出其與廣大社會關係連結的獨特性（Kanetsuna & Smith, 2006）。

## （二）社會結構與行動主體的中介層面探討

### 1. 日本政府面對霸凌問題的處理策略及方式

面對層出不窮的自殺事件與日益嚴重的霸凌問題，日本政府展開一連串大規模的霸凌調查行動（The Japan Times Online, 2010b, 2010c）。1994年文部省（Monbusho，文部科學省的前身）組成「兒童問題行爲研究會」，對兩萬名孩童進行霸凌問題的調查，並於1996年提出報告，報告中

所指出霸凌問題的五個主要因素中，最強烈的認知就是「絕不能容忍任何人對他人的霸凌行爲」(Naito & Gielen, 2005: 170)。於是日本政府要求各地方教育當局重新檢視反霸凌工作的成效，並從1996年起逐年增加學校輔導及社工人力，至2013年，13,800所公立小學及9,835所公立初中已配置學校輔導人員，學校社工人數亦擴增至1,355人(內閣府，2013)。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最主要的因應策略還包括：強化情緒教育、修訂《學習指導要領》並致力增加學童成就感使其喜歡上學、提升教師素質並在師資培育階段納入相關研習課程、「出席停止制度」的運用、對學童施予適度懲戒但不能體罰、不定時實施問卷調查、設置24小時霸凌諮詢電話專線等(文部科學省，2011b；林明煌，2008：20；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由於受到霸凌方式日趨多元化、霸凌型態日漸複雜化、霸凌技巧日益細膩化的影響，霸凌的行爲模式也呈現出多元的面貌，舉凡像冷嘲熱諷、排斥、以網路或手機誹謗中傷、勒索、藏匿東西、偷竊、破壞、丟棄、嚴重地踢或打、遊戲時輕微地踢或打等，都屬於霸凌行爲；再加上日本於2006年(平成18年)起從受害者的立場將霸凌定義為：「無論校內或校外，只要學生受到來自特定關係人，透過心理或物理方式的攻擊，以致在精神上產生莫大的痛楚」，並將霸凌事件的統計方式從「發生件數」改為「認知件數」，因此，霸凌事件的統計數字在2006年時比2005年增加了近10萬件，達124,898件之多。之後每年的數字都呈現減少的情況，2007年降至101,097件，2010年又降至75,295件，不過到了2012年又升至144,054件(文部科學省，2011a；內閣府，2013；The Japan Times Online, 2007b)。

由於霸凌發生件數在減少後又出現大幅增加的現象，因此日本政府持續將霸凌問題視為教育的優先議題，並在「教育再生會議」中，商討霸凌問題的因應對策(文部科學省，2011d，2011e)。然而，霸凌問題常伴隨著複雜的社會問題，且霸凌不單純只是一種偏差或暴力行爲，它同時有可能是一種有組織、有目的、有意識的抗拒作為(Willis, 1977)，因此，霸

凌問題的處理常難以即刻見效。

## 2. 在東西方不同脈絡文化交會下所形塑出的獨特校園文化

日本遠從明治維新開始就極力提倡西化，教育方面亦師法歐、美等先進國家，並灌輸孝道、忠君愛國等思想。到了近代，日本仍然採取英、美新右派教育改革模式，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新管理主義（New Managerialism）及市場競爭原則下，一方面要求提升學生學業成績，以強化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仍然持續實施具有日本傳統精神的道德教育，在西方的開放競爭與東方的保守服從兩股不同脈絡文化的交會下，形成了日本獨特的校園文化（林明煌，2009；楊思偉、陳盛賢、江志正，2008；歐用生，2007；Naito & Gielen, 2005）。

日本的教育制度向來就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嚴密科層體制，爲了達成前述目標，學校嚴格要求學生遵守各種規定並服從團體紀律，以打造成適應未來社會生活方式的「普通人」，而非具有獨特特質的「個人」；校園中，團體的需求永遠高於個人的需求。所有的家長及學生都知道，在日本，成功的唯一之道就是通過標準嚴格的考試以進入好學校，因此，爲了通過「考試地獄」的試煉，當一個循規蹈矩、努力讀書、服從師長的好學生是必要的（Naito & Gielen, 2005）。

在這種團體規範與榮譽至上的校園氛圍中，老師與學生往往成爲集體霸凌的幫凶，例如，以公開嘲諷、集體排斥等方式迫使受害學生遵守規定，讓受害學生因遭受同學的排擠而自殺。因此，就在教師教學與管教方式助長校園霸凌風氣的擴散效應下，日本的校園霸凌問題日益惡化，連仍抱持儒家思想並自以爲高高在上的教師，都已經發現班級秩序已惡化到無法控制的地步（文部科學省，2011c；The Japan Times Online, 2006）。

於是，日本的校園霸凌問題也就鑲嵌在這種既追求開放又要求保守的校園文化中，成爲社會問題的縮影。這不僅反映出校園文化中諸多不合理的問題，也讓教師反思，是否常將自己的看法強加在學生身上，忽略了學生看待世界的觀點（Blumer, 1962）。

### （三）行動主體的行為意涵分析

#### 1. 霸凌行為是學生傳達不滿及宣洩情緒的一種表現方式

學生是有獨立思考及行為能力的主體，Bourdieu（1990）認為相似階級的人，會透過互動過程，在相似的環境中建構出符合階級標準的「習性」，然而，當行動主體受到社會結構的制約或壓迫時，就會以實際行動加以反抗（Willis, 1977）。例如，日本年輕世代，在無法找到「生存的意義」，也無法容忍高度學業壓力的挫折與失敗下，於是轉以欺凌或暴力行為尋找宣洩情緒的出口（Hara, 2002）。然而，雖然傳達了不滿、宣洩了情緒，但同時也製造了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

#### 2. 霸凌行為是學生對團體既疏離又依附的一種矛盾現象

學生對於同儕團體有種強烈的依附感，也因而發展出不同類型的同儕文化；在偏差型或反叛型文化的同儕團體中，受凌者與霸凌者往往隸屬於同一團體。例如日本青少年的受凌者，明知自己在同儕團體中是被集體霸凌的對象，卻因需要同儕團體的友誼與保護，以致無法從團體中抽離，這一種對團體既覺得疏離又有依附需求的矛盾情結，往往也是造成受凌者痛苦不堪的原因（Naito & Gielen, 2005）。

#### 3. 霸凌行為是學生有意識、有目的及有組織的抗拒行動

在霸凌者發動的霸凌行動中，霸凌事件的類型可能是單一型態，也可能是多種類型的混合體；而霸凌事件的涉入角色中，各種角色可能運用不同類型的霸凌型態組合成霸凌事件，角色之間也會相互轉換，今日的霸凌者，可能成為明日的受凌者，亦有可能成為來日的旁觀者（Olweus, 2001; Salmivalli, Lagerspetz, Björkqvist, Österman, & Kaukiainen, 1996）。在日本發生的霸凌事件中，皆可看到有組織的分工、角色的分派等模式（The Japan Times Online, 2009），故霸凌行為通常並非偶發，而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及有組織的抗拒行動。令人遺憾的是，原本應該將如此有組織的行動用來對抗的是不合理的社會體制，如今卻反而將矛頭指向比自己弱

小的同學身上，成爲一種霸凌行爲。

#### 4. 霸凌行爲可以作為瞭解學生流行文化及社交工具的中介

從學生的霸凌行爲中，我們往往能窺見學生的流行文化與當前重要的社交工具爲何。以學生同儕之間常見的關係霸凌爲例，霸凌者排斥及孤立受凌者，使其人際關係受影響而被排拒在團體之外，通常是因爲受凌者與霸凌者所屬的團體文化不相容。

另外，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的發達和普遍使用，網際網路和手機已成爲年輕人重要的社交工具，資訊科技也成爲最新型態的霸凌工具之一，因此霸凌已轉變成更加地細微不可見，諸如散播謠言、寄送傷人的文字訊息等方式。而日本社會受到此一潮流的影響，在網路上隨處可見自殺網站的設立，並透過網路社群而相互連結。2004年9月，一群彼此不認識的年輕人透過網路相約集體自殺，且死意堅決，他們害怕孤單地活著，所以約定一起作伴尋死（Ozawa-de, 2008）。由此可見，並不可小覷學生流行文化與資訊科技在霸凌事件中的影響力。

## 二、臺灣

臺灣霸凌問題的出現雖然不是近年來才發生的事情，但卻直到2010年12月桃園縣某所國中發生「老師遭學生霸凌」、「女同學遭霸凌、強拍裸照」、「學弟遭學長霸凌」等事件後，才獲得教育當局的重視。當時的教育部長也認爲「校園霸凌問題比想像中嚴重」，除了積極研擬相關法令的修正外，地方教育局長、學校校長及學務主任也爲這些事件下臺負起政治責任（王彩鸞，2010；吳佩玲、賈寶楠、曾增勳，2010；羅印冲、郭安家，2010；嚴文廷，2010）。可見臺灣霸凌問題的處理，在媒體及社會大眾的關注下，已不單純是個教育問題而已。以下將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臺灣霸凌問題的出現及其與社會學相關之因素。



## （一）社會結構因素探討

### 1. 政經轉變與價值多元衝擊下的社會文化

臺灣自解嚴以來，政治上雖然日趨民主開放，但也呈現出威權轉型後失序與混亂的景象，政黨之間的惡性競爭、國會殿堂時常上演的打架鬧事戲碼、各種社會力量解放後的對立衝突不斷，凡此種種，皆對學生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何展旭、呂啓元、黎家維，2011）。

而經濟方面，近年來受到全球性經濟景氣不佳的影響，再加上隨著勞動市場的轉變，雖然取得大學文憑者日多，但所獲得的薪資卻反而減少，超時的工作壓力與負擔更引發身心健康等諸多問題，對於家庭生活、家人互動等各方面影響極大（王佳雯、鄭雅文、李諭昇、徐傲暉，2010）。

至於社會結構方面，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造成階級差異的鴻溝日深，較低階級之少年可能因此尋求不合社會規範的慰藉管道，中上階級之少年也可能因而產生輕微的偏差行為（周愨嫻，2004）；大眾傳播媒體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模式下，爲了獲得閱聽者的喜愛，不斷出現色情、暴力等各種腥羶的新聞，這些報導對臺灣少年的暴力行為的確也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陳毓文，1999）；最後是社會價值觀的嚴重扭曲，在社會大眾競相用「消費」來標示個人的身分認同、用風格與品味來彰顯自己的獨特性時，更讓青少年在物慾橫流的社會中迷失了自我（胡正文，2006）。

在這種多元失序、價值觀扭曲的社會環境中，人民往往以各種形式的抗議活動來表達對體制的不滿，甚至以不見容於社會規範的方式發洩心中的怨懟，而長久處於這種對立與不安的氣氛下，就如同Marx（1976）所言，人與社會間的關係會產生「異化」的現象，而人已漸爲物所役使。不過，行動主體的動能在不斷蓄積下，仍會突破結構障礙，展現出主體對抗結構的可能性。

### 2. 校園霸凌事件與媒體報導所呈現出的社會結構問題

臺灣霸凌問題的發生並非一朝一夕之事，在2010年底霸凌問題被正式

列入偏差行為之前，舉凡校園內學生脫序、違規的行為，大抵皆以「偏差行為」來看待之。然而「偏差行為」的定義往往與當時的社會規範有關，同樣一件事發生在不同文化、不同國情、不同法律規定的社會中，就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與看待標準。而社會規範的產生也往往與社會問題的發生有直接關聯，尤其若當時社會上發生引起媒體及社會大眾關注的事件時，就會再產生新的社會規範，以制約或規訓學生不合常理的行為表現。由此可見，偏差行為與社會問題之間有密切的相關。從Durkheim（1961）的觀點來看，偏差行為就是一種逸出社會規範的失序現象，必須重建一個和諧而有道德的社會秩序，但問題在於當道德標準與學生文化相衝突時，道德反成為衝突的主要來源。

臺灣媒體在校園霸凌事件的報導上，即以自己設定的道德標準在看待校園霸凌問題。從2010年12月底桃園縣某所國中爆發霸凌事件開始，霸凌新聞迅即登上各家媒體的頭版，並接連數天持續報導，各電視臺政論節目亦相繼邀請來賓討論，霸凌問題不僅一躍成為全國關注的話題，「霸凌」更成為人人朗朗上口的流行語，而此一新聞熱度大約持續延燒至2011年1月中旬，此後媒體的焦點逐漸轉移至其他事件，並在媒體於2011年4月中旬報導監察院調查結果後暫告一段落（李順德，2011）。

回顧臺灣媒體對於校園霸凌事件報導的處理方式，是以挖掘各種內幕消息作為手段，接著一個個負面新聞不斷被披露，學校被形容是「恐怖校園」，幫派、黑社會、槍械、性侵、索保護費等全與霸凌畫上等號（余艾苔，2010）。就在媒體綜藝化與戲劇化報導方式的推波助瀾下，霸凌不再只是霸凌而已，它已被媒體及社會大眾加入了許多想像，並添加了不同的成分在其中。

然而校園霸凌事件背後的真正原因呢？張麗鵬（2003）認為是受到「暴力類媒體、情色類媒體、鬼怪懸疑類媒體」及「好奇型同儕、尋求刺激型同儕、同儕偏差行為」的影響；盧名瑩與董旭英（2010）則認為是因為金錢態度與偏差同儕的關係；周愷嫻（2004）發現父親從事愈高層主管工作者，少年偏差行為發生率愈高；王俐容與陳偉鳳（2010）則從臺灣青

少年所盛行的自拍現象出發，探討青少年文化所呈現的複雜、衝突與矛盾性，故傳統偏差行爲的概念或是抵抗的次文化（subculture）立場都無法充分解釋與說明青少年次文化（adolescence subculture）的現象。前述研究所指陳的霸凌發生原因，正與整體社會文化息息相關，可見探討學生霸凌問題是無法與社會問題做切割的。

弔詭的是，媒體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原本媒體是以揭露不爲人知的黑幕作爲訴求，但是在新聞報導的惡性競爭下，漸漸也產生失焦的現象，甚至有可能成爲助長霸凌的幫凶，因爲一幕幕聳人聽聞的畫面，往往已造成令人意想不到的影響。結果是，媒體在有意或無意的情況下，成爲助長霸凌問題的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 （二）社會結構與行動主體的中介層面探討

### 1. 臺灣政府面對霸凌問題的處理策略及方式

我國政府在校園霸凌事件發展過程中的處理態度及反應被認爲慢半拍，教育部長也因發言風波被點名下臺負責，不過真正負起責任的是地方及學校，教育局長、學校校長及學務主任全部請辭或停職獲准，連桃園縣長也認爲施政民意調查數據受此影響極大（吳佩玲、羅緝綸、張念慈，2010），最後甚至連總統都出面提示霸凌處理四原則：「主動發掘、明快處置、配合偵辦、對外說明」（教育部，2011d），可見霸凌問題在媒體的強力報導下，已從教育問題變成社會問題再一躍成爲政治問題。

在外界的批評聲浪中，教育部於2011年1月10日公布了「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此計畫是教育部回應霸凌問題的最主要政策，在計畫中，教育部提到校園霸凌事件是學生嚴重偏差行爲，故必須採取三級預防的執行策略：第一級預防著重「教育與宣導」，此階段的重點在於法治、品德、人權、生命及性別平等教育；第二級預防著重「發現處置」，此階段的重點在於警政網絡的支援及校內「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的成立；第三級預防則著重「輔導介入」，此階段的重點在於專業心理諮商人員的協助及警政、社政單位的通報（教育部，2011d）。

從前述計畫內容可以得知，教育部著重建立更安全、更友善的校園環境，並以「輔導」為主、「法律」為輔之雙管齊下方式，來達成導正學生偏差行為與維護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權益之目的，然而，面對這種種的作法，外界仍質疑會不會只是一種為了回應媒體的窮追猛打以求解除政治危機的權宜之計（諶淑婷，2012）。

事實上，教育部為瞭解學生在學校是否遭受到霸凌，故要求中等學校及國小五、六年級於每年4月、10月辦理記名及不記名的「校園生活問卷」調查，並詢問填答者包括：過去六個月內是否曾經被同學毆打、勒索金錢或物品、惡意孤立與排擠、惡意的語言恐嚇或威脅、謠言中傷、網路傷害等問題（教育部，2011a），再依據校園霸凌定義的四大要件加以開會認定是否為霸凌事件。

除此之外，進一步分析教育部2011年公布的「2010年各級學校校園事件統計分析報告」中各類型霸凌的統計數字後發現，其中發生次數最多的分別是國中的肢體霸凌137件、國中的關係霸凌10件、國中的網路霸凌4件、國中的言語霸凌25件、國小的反擊型霸凌1件，整體霸凌件數總計288件，約占校園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總件數3,013件的9.6%。偏低的數據似乎與外界想像的「校園霸凌肆虐」的「恐怖景象」有著極大的落差，也與媒體報導所呈現出校園日益惡化的霸凌問題有一段差距。推估的原因是，一來霸凌問題獲媒體及教育當局重視已在2010年12月，二來教育部發函各校要求落實通報的時間已是2011年1月10日（教育部統計處，2011）；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應該還是媒體對於校園霸凌事件的報導方式，導致外界對於此類事件有著認知上的「刻板印象」。

由前述分析可以發現，受到媒體大肆報導的影響，霸凌問題的處理極易在政治人物介入下被視為是政治問題而模糊了焦點，不過，教育部最終仍回歸到三級預防的處理機制，並從教育層面著手以掌握問題的核心。然而，面對擁有複雜結構的霸凌問題，仍要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急就章方式，才能讓霸凌獲得真正的重視及有效的處置（陳利銘、鄭英耀、黃正鵠，2010）。

## 2. 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潮相互拉扯下所呈現出的校園文化張力

學校是小型社會的縮影，一方面社會中的主流價值、道德規範、法令規定等會影響學校的校規訂定、教學活動、師生互動等，另一方面社會中所出現的對立、衝突、失序、多元價值等，也常常在不知不覺中進入學校，成為校園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學校面臨到的兩難問題是，既要扮演協助學生社會化的角色，又要將社會中多元價值的觀念教導給學生，也因而啓發他們對於現狀的不滿與批判；這種既想讓學生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又希望學生批判社會不公不義的截然不同的立場，其實是既對立又相容，並充滿了矛盾與衝突的。

臺灣校園正遭遇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潮相互拉扯的緊張狀態。從傳統文化的觀點來看，校園權力是依據儒家文化的「差序格局」原則做最好的分配與安排，每個人皆需各正其位、各守其分，故「安分守己」才是人民應遵守原則的最佳寫照（翟本瑞，2002）；於是，校園中也要求師生依其「才、德、能」以盡其本分，故權威與紀律是嚴明的。另外，源自千年前科舉制度的升學主義，更在社會文化脈絡中形成盤根錯節的結構（周愚文，2008），無論入學制度如何改革，考試考高分、取得好名次、進入好學校，仍然是學校奉為圭臬的不二法則，凡無法循此模式者，即非循規蹈矩、努力讀書、服從師長的好學生。

在傳統文化的道德規範及價值標準下，霸凌問題當然被視為是偏差行為，故必須將其導正過來，以維護校園秩序及安全，故當學生出現偏差的問題與行為時，便要透過種種矯正手段，將有偏差行為的學生順利整合進入成人的世界與價值體系中（王俐容、陳偉鳳，2010；教育部，2011a）。

然而，若從現代思潮的觀點來看，校園權力不再是以權威為中心，學生才是學習的主人，故加諸於其上的種種不合理規定都應該被解放與鬆綁。例如：教師的管教要顧及學生的自尊心、學生的髮禁應該完全解除、學校的校規要檢視是否符合世界人權法治潮流等（林佳範，2004）。在學生權益成為校園行事的中心準則後，一時之間，行之有年的各種規定與制

度彷彿皆成爲不合時宜的「過時產物」。加上民主發展下權力意識的高漲，也使得家長、媒體及人權團體可以藉由投訴、爆料、召開記者會等方式，對校園進行無所不在的監看（Foucault, 1963/1979）。於是當學生自覺受到不合理對待時，便能啓動監看機制，並轉換成一種揭露校園黑幕的「揭弊」作爲；在學生中心的思維下，學生的主體性被凸顯了，但卻也造成校園事件的失焦。

若以現代思潮重視學生人權與基本需求的論點來看霸凌問題，霸凌所顯現的是學生基本需求的匱乏與心理層面問題的未獲重視，故處理霸凌問題並非施以矯正手段即可，重點在於療癒的過程（顏正芳，2010）。

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潮相互拉扯所形成的校園文化中，學生身陷被社會化或反社會化之間對立又相依的矛盾結構，於是只能不斷游移與跨越，並試圖尋求自己的定位，然而主體卻也可能在游移與跨越之間踰越了界限，演變成複雜的霸凌問題。

### （三）行動主體的行爲意涵分析

#### 1. 霸凌行爲是學生區辨異己及形塑同儕文化的手段

學生文化的形成，深受學校及同儕的影響。張建成（1988）針對學業成就及活動取向兩大因素做交叉分析，將學生的同儕文化歸納成四種不同類型：統整型、社交型、主知型及冷漠型；而Willis（1977）研究勞工階級的學生，發現他們擁有明顯可以作爲區隔及識別的次文化，包括：特立獨行的服裝、習性、行爲風格、語言等文化實踐方式；Ogbu與Fordham（1986）的研究也發現，學生爲了取悅同儕，可以犧牲學業成就以換取同儕接納；黃振賢（2011）的研究也指出，國小學生的班級同儕關係會影響霸凌行爲的發生，被同儕拒絕或排斥的學生最容易受到霸凌。

由此可見同儕文化對學生霸凌行爲的影響力。學生爲了獲得同儕友誼及團體的歸屬感，可能會以發起或參與霸凌行爲來作爲「我群」（we-group）的標記，而「非我族類」就可能淪爲受凌對象。

## 2. 霸凌行為是學生挑戰主流價值的行動展現

學校常不假思索地將社會主流價值、道德規範、法令規章等移植到校園中，並藉以規訓學生的行為。Pollard (1982) 指出，面對成千上百位學生複雜瑣碎的事件，為了促使學生在最短時間內達到學校的要求，學校常常採用例行化的策略來管理學生。然而這些例行化策略卻往往衝擊到學生的次文化，造成彼此之間的衝突不斷，而學生之間同時也會逐漸形成反學校文化，因而發展出各種型態的霸凌行為，以作為對抗主流價值的行動象徵（吳瓊洳，2000）。柯采伶（2009）的研究也提醒我們，校園環境中潛藏著任何可能引發霸凌的觸媒，所以必須加以謹慎因應及防範。然而，學生藉由霸凌行為挑戰主流價值的同時，也對社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

## 3. 霸凌行為是學生強化自我認同及建立團體地位的工具

學生的同儕團體是社會組織的縮影，他們自有一套制度、規章與分工模式，而霸凌行動的發起者，可能就是同儕團體中的領導者，同時，看似散漫結構散漫的霸凌行動，其實往往存在著綿密的角色分工與計劃性的行動模式（吳瓊洳，2000；Olweus, 2001）。於是，學生藉由霸凌行為衝撞體制，讓自己被冠以「霸凌者」的稱號，但卻贏得了同儕團體中其他成員的尊敬，也獲得地位的提升，更因此強化了自我的認同。久而久之，為了顯現自己的與眾不同，霸凌行為也就愈加地推陳出新，具有更嚴重的傷害性。

## 4. 霸凌行為能讓學生發洩生活中的怒氣並做現實生活中不敢做的事

由於現實生活中缺乏發洩的管道，因此學生轉而向虛擬世界尋找可能的出口。網路世界中，由於其匿名性及便利性，學生會透過散布謠言、言辭攻擊、騷擾等各種方式對受害者進行霸凌（朱美瑰，2008；吳明隆、簡妙如，2009；陳怡儒、鄭瑞隆、陳慈幸，2010）。根據兒童福利聯盟公布的「網路霸凌現象調查報告」中指出，4成兒童曾為網路霸凌幫凶，他們

在Facebook中批評他人的文章按「讚」或回覆留言（諶淑婷，2012）。對文章按下一個「讚」，看似一根手指敲鍵盤或滑鼠的小動作，卻代表著學生想要發洩生活中的怒氣並做現實生活中不敢做的事的一種欲望。

## 肆、日本與臺灣霸凌問題的比較研究

經過前述文獻及文件的分析後，茲將日本及臺灣霸凌問題相關資料做進一步整理，並以社會學觀點從不同層面加以綜合分析。

### 一、社會結構層面

#### （一）霸凌問題就是一種社會問題

無論是日本鬧得沸沸揚揚的學生自殺事件或是臺灣發生的嚴重偏差行為，都與霸凌問題有密切關聯，而這些霸凌問題的背後皆指向長久以來存在的社會問題。故霸凌問題的發生，其實也反映了整體社會結構的問題。

#### （二）媒體是促使政府重視霸凌問題的催化劑

霸凌問題發生後，無論日本或臺灣的媒體所發揮的功能及扮演的角色都讓人不能小覷。在社會大眾的關注下，日本首相到國會發表演說，而臺灣總統則出面提示霸凌處理四原則。在媒體的持續報導下，霸凌問題也從校園事件提升到社會事件、甚至政治事件。

#### （三）霸凌問題與校園文化、社會文化息息相關

霸凌問題發生的原因並不單純是學生行為偏差，它往往可以從校園文化脈絡中找到蛛絲馬跡，也可以連結到社會文化脈絡中找到背後更深層的結構問題，故霸凌問題與校園及社會文化間彼此息息相關。

### 二、社會結構與行動主體的中介層面

#### （一）霸凌問題呈現出行動主體與社會結構交會下的深層意涵

從霸凌問題的表層來看，霸凌是一種恃強欺弱、對他人造成身心傷害



的行爲；然而若從霸凌問題的深層來看，霸凌也是一種行動主體與社會結構交會下的產物，其中糾結著自我認同、情緒發洩、人際互動、同儕關係、流行文化、抗拒行動等諸多相互關聯的因素。因此，無論是日本或臺灣發生的霸凌問題，背後都具有更深層的意涵。

### （二）不同的霸凌定義及相似的處理心態

日本以“*Ijime*”這個日文發音的詞代表霸凌，以顯示出其與更廣大的社會關係連結的獨特性，對於欺凌的定義則採取從受害者認知立場的解釋，因此在處理霸凌問題的心態上會從受害者立場出發，去瞭解霸凌發生的原因。而臺灣則採取國際通用之定義來界定霸凌，雖然在處理霸凌問題的經驗方面起步較晚，但爲了瞭解學生是否遭遇霸凌，以問卷方式進行調查，並以「輔導」爲主、「法律」爲輔之雙管齊下方式，導正學生的偏差行爲。

## 三、行動主體層面

### （一）性別是造成霸凌型態差異性的主因

日本對於霸凌的研究發現在性別上有其差異性，男生霸凌的型態偏向於肢體動作，故顯而易見，也比較容易處理；相反地，女生霸凌的型態偏向於語言的使用，故往往因隱而未見而不容易被發現，處理上也有其困難度。臺灣雖然還在起步階段，但性別差異的問題遲早會顯現出來。

### （二）網際網路的使用已促使霸凌問題更加惡化並難以處理

在日本，網際網路和手機已成爲年輕人重要的社交工具，資訊科技更成爲最新型態的霸凌工具之一，而透過網路相約集體自殺的事件，也讓霸凌問題愈加地複雜難解。至於臺灣，網際網路也漸漸成爲學生的霸凌工具，且殺傷力十足，影響範圍更是難以估計。

## 四、綜合分析

### (一) 日本

在日本高度競爭並講求紀律的社會文化中，遵守團體規範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生存價值，然而面對政經環境的劇烈改變，社會一再出現失序的現象，加上校園內競爭激烈的考試壓力所引發師生集體霸凌的助長下，學生的霸凌問題不斷浮現，並以自殺事件作為引信，將此問題引爆開來，同時也成為媒體及社會大眾極度關注的社會議題。

雖然政府一再努力施以相關策略，希望有效減少霸凌行為的發生，然而霸凌問題除受到社會結構及行動主體的交互影響外，最主要的是霸凌還涉及學生同儕文化、自我認同等因素，這讓霸凌問題的處理更加困難。

### (二) 臺灣

在臺灣政治對立、貧富差距擴大、價值觀扭曲的社會環境中，原本的威權體制已受到解構與挑戰，然而學生面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潮相互拉扯所形成的校園文化之影響下，接連發生偏差行為及霸凌行為，而這更在媒體的大肆報導下，成為社會大眾討論的熱門話題。

政府雖然已訂定三級預防的執行策略，但還需要進一步將社會、校園等結構因素與學生同儕文化等主體因素連接起來，以深入問題核心並增進處理成效。

### (三) 小結

綜合前述分析，本研究進一步將霸凌問題與相關因素之關係整理成圖 2。

由圖 2 可以發現，霸凌問題是由行動主體與同儕文化、校園文化及社會文化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的產物，故處理霸凌問題也必須兼顧不同層次的思考，方能尋求整全性的解決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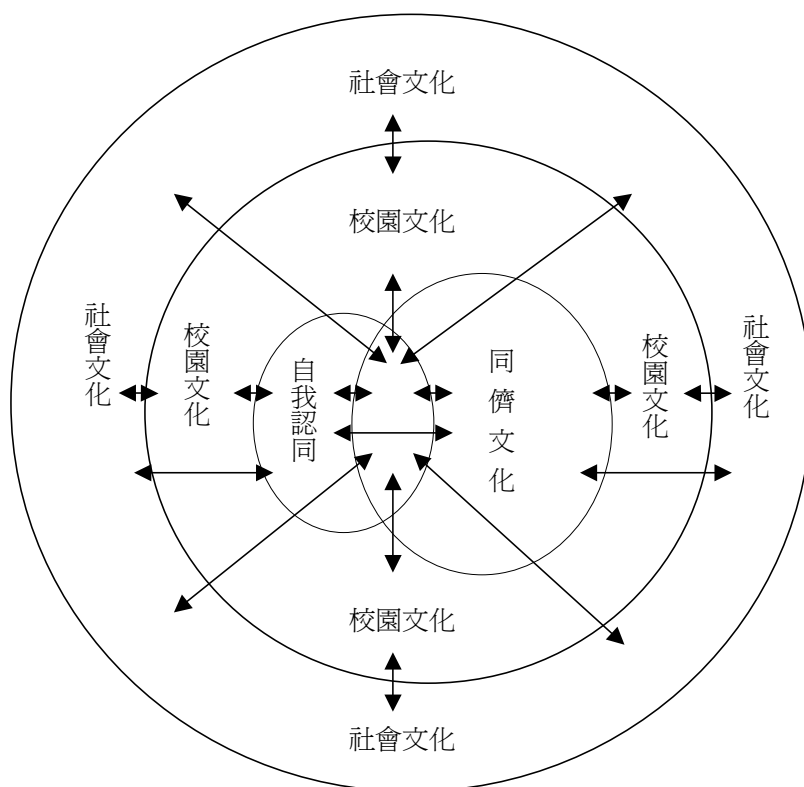


圖 2 霸凌問題與相關因素之關係

## 伍、結論與建議

經過前述的比較研究及綜合分析後，從日本與臺灣的社會文化脈絡中，提出結論與建議如下：

### 一、結論

日本及臺灣對於霸凌問題皆相當重視，且在不同定義下有著相似的處理方式，然而霸凌問題往往與社會文化脈絡中的諸多因素糾結在一起，故

在成效方面確實難以立竿見影。

日本發生的霸凌問題往往隱而未見，直到爆發學生自殺事件時才驚覺其嚴重性；而臺灣則容易忽視霸凌問題的嚴重性，直到一發不可收拾時才開始認真思考解決策略。無論如何，鑲嵌在自我、同儕、學校及社會多重因素相互影響下的霸凌問題，確實呈現出多層次及多維度的面貌。

本研究透過社會學觀點的分析與比較研究，將霸凌問題放置在校園、社會文化脈絡等相關因素交織而成的複雜網絡中，加以層層剖析後又重新構連在一起，不僅從縱向層層挖掘、深入核心，也從橫向不斷延伸、串連成整體。由此可知，霸凌問題的處理，不能光從表層加以防治或導正而已，否則在校園及社會文化相關因素的促發下，霸凌問題仍可能不斷湧現，甚至產生更多元的形貌。

## 二、建議

根據前述結論，茲從日本與臺灣比較研究的觀點，對政府、媒體、學校及教師提出建議如下：

### （一）政府

霸凌問題所反映出的不只是一種霸凌者對受凌者的欺侮行為或傷害而已，在霸凌者、受凌者、旁觀者等角色交互且重疊之情況下，霸凌問題往往顯現出盤根錯節的複雜性。而日本政府對於霸凌問題即抱持著重視、不輕忽的態度，從發生直到現在，仍不斷投入人力以協助學校解決問題。故臺灣相關單位應更積極投入霸凌的研究工作，配置給學校更多輔導及社工人力，並將霸凌放置在校園及社會文化脈絡中加以探討，深入瞭解並找到臺灣霸凌問題的成因，進而研擬出更為可行的解決方法。

### （二）媒體

媒體對於議題的報導與關心，往往是促使政府重視問題的解決與處理方式的主要力量，故一定程度上也發揮了媒體作為「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之外第四權的功能。日本的媒體就是扮演著窮追猛打、深入報導及

喚起社會大眾重視的關鍵角色，臺灣媒體可資借鏡。然而，媒體對於議題必須深入瞭解，以免流於浮面、膚淺及譁眾取寵式的報導方式，反使得社會大眾產生誤解，並造成失焦的現象。

### （三）學校

#### 1. 制度面

學校的制度、規定及種種與學生有關之措施，對於學生及同儕文化的形成皆具有直接的影響。若校園內存在著階級、種族、性別偏見及歧視的文化，或硬生生將主流價值規範套在所有學生身上，學生終將產生反抗的行動，甚至導向偏差或暴力的行為。以日本的服從與靜默文化而言，正是造成學生有苦不敢言、有話不敢說的溫馴表相文化的幫凶之一。故學校的威權與科層文化必須被破除，所有的不公義必須被推翻，重新省視學生的需求，並從學生的立場出發，建構一個具有包容、接納、溫馨、關懷的環境，讓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都能擁有公平競爭及出人頭地的機會。

#### 2. 管理面

身為學校的各層級管理者，面對霸凌事件時，除了依照教育部訂定的原則行事外，還要從相關涉入者的同儕關係、家庭結構、社區環境等著手，並從各種可能因素拼湊出霸凌問題的真實樣貌，再層層剝開以深入問題核心，進而在各種資源的妥善運用下，制定出有效的解決策略。以日本為例，當霸凌者已危及他人的生命安全時，校長必須做出緊急處置，以維護多數學生的權益。臺灣學校的管理者也應該思考如何在恰當的時機點，做出適當而有效的處置措施。

### （四）教師

#### 1. 師生互動方面

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關係、教學的模式、看待學生同儕文化的角度等，都會讓學生感受到教師是否真心關懷學生，並與學生站在同一立場；如果老師動輒訴諸規定，並自顧自地以為如此做就是為學生好，往往容易產生

衝突與對立，甚至讓學生的不滿以霸凌等方式轉嫁到他人身上。日本的教師常常以權威者的角色訓誡學生，造成師生之間的鴻溝加深，是故教師必須多以同理心看待學生問題，並以貼近學生的語言拉近彼此的距離，以作為學生同儕文化、校園文化及社會文化之間的溝通橋梁。

## 2. 教師增能方面

在教育政策急遽變動的環境中，在學生人權至上的時代裡，教師除了被賦予傳道、授業及解惑的神聖使命外，還要扛起各種法令所規定的責任，更要小心翼翼以避免因管教問題衍生家長抗議及投訴等舉動。於是，教師走在傳統的尊師重道、現代的人權至上及後現代的多元失序交織而成的十字路口，陷入舉步維艱、動輒得咎的困境中。對日本教師而言，在日本教育改革的左右搖擺、理論不一、矛盾混亂中，教師往往成為教育改革失敗的箭靶，面對霸凌問題的處理，更陷入進退失據的窘境，也因此，霸凌成為教師棘手的難題，只要稍一不慎，就會招致意想不到的「後果」。然而，無論日本或臺灣的教師，都可以主動參與霸凌辨識與處置的訓練課程，並藉由同儕合作的支持力量，展現處理與解決問題的專業能力及自信心。

## 參考文獻

- 文部科學省 (2011a)。いじめの認知学校数・認知件数。2011年8月4日，取自 <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lid=000001076981>
- 文部科學省 (2011b)。生徒指導等の施策の推進。2011年8月5日，取自 [http://www.mext.go.jp/a\\_menu/shotou/seitoshidou/04121502.htm](http://www.mext.go.jp/a_menu/shotou/seitoshidou/04121502.htm)
- 文部科學省 (2011c)。生徒指導等について。2011年8月9日，取自 <http://www.mext.go.jp/amenu/shotou/seitoshidou/index.htm>
- 文部科學省 (2011d)。自殺の状況。2011年8月4日，取自 <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lid=000001076986>
- 文部科學省 (2011e)。児童生徒の問題行動等生徒指導上の諸問題に関する調査。2011年8月4日，取自 [http://www.mext.go.jp/b\\_menu/toukei/chousa01/shidou/1267646.htm](http://www.mext.go.jp/b_menu/toukei/chousa01/shidou/1267646.htm)
- 內閣府 (2013)。平成25年版 子ども・若者白書 (全体版)。2015年6月24日，取自 [http://www8.cao.go.jp/youth/whitepaper/h25honpen/pdf\\_index.html](http://www8.cao.go.jp/youth/whitepaper/h25honpen/pdf_index.html)
- 王佳雯、鄭雅文、李諭昇、徐傲暉 (2010)。職場社會心理危害調查監測制度之國際概況。臺灣衛誌，29 (6)，551-560。
- 王俐容、陳偉鳳 (2010)。偏差行為或是抵抗的次文化？從自拍風潮思索臺灣青少年現象。國際文化研究：真理大學通識教育學報，6 (1)，71-106。
- 王彩鸞 (2010，12月21日)。吳清基：校園不能沒法治。聯合晚報，A3版。
- 朱美瑰 (2008)。網路犯罪新型態～看不見的拳頭：青少年網路霸凌現象初探。諮商與輔導，268，6-10。
- 何展旭、呂啓元、黎家維 (2011)。校園反霸凌法立法問題之探討，2011年1月21日，取自 <http://www.npf.org.tw/post/2/8602>
- 余艾苔 (2010，12月21日)。校園霸凌真嚴重。蘋果日報，辣蘋果專欄。
- 吳佩玲、賈寶楠、曾增勳 (2010，12月22日)。霸凌處理不當 八德校長調職。聯合報，A1版。

- 吳佩玲、羅緝綸、張念慈（2010，12月27日）。殿後縣市長「再加油」。聯合報，A11版。
- 吳明隆、簡妙如（2009）。青少年網路霸凌行為探究。中等教育，60（3），90-109。
- 吳瓊洳（2000）。國中學生反學校文化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李順德（2011，4月15日）。八德國中霸凌案 監院：校長領導無方。聯合報，A16版。
- 林明煌（2008）。從日本《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探討其教育變革與發展。教育資料集刊，40，49-83。
- 林明煌（2009）。日本小學新《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與其內容之探討。教育資料集刊，41，61-96。
- 林佳範（2004）。憲法入校園——淺論學生人權的法律保障。師友，449，8-14。
-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4）。國小兒童校園霸凌（bully）現象調查報告。2012年2月11日，取自[http://www.children.org.tw/database\\_report.php?id=153&typeid=4&offset=50](http://www.children.org.tw/database_report.php?id=153&typeid=4&offset=50)
- 周愚文（2008）。科學制度中三個重要問題的現代分析。教育研究集刊，54（1），1-14。
- 周憐嫻（2004）。社會階級與少年偏差行為關係。犯罪學期刊，7（1），31-48。
- 柯采伶（2009）。真的只是囡仔的打鬧嗎？——國中霸凌者校園霸凌行為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胡正文（2006）。從消費現象論臺灣社會趨勢與價值觀的變遷。實踐通識學報，6，31-66。
- 張建成（1988）。學生疏離及其在班級團體中的關聯因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張源泉（2006）。J. Habermas：批判理論之集大成者。載於譚光鼎、王麗雲（主編），教育社會學：人物與思想（頁341-366）。臺北：高等教育。
- 張麗鵑（2003）。媒體閱聽、同儕關係與少年偏差行為相關性之研究——以南投



- 地區為例。犯罪學期刊，6（2），217-250。
- 教育部（2011a）。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2011年10月17日，取自 <http://140.111.1.88/rule/detail/11>
- 教育部（2011b）。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11年8月10日，取自 <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
- 教育部（2011c）。認識校園霸凌。2011年8月10日，取自 <http://140.111.1.88/news/detail/22>
- 教育部（2011d）。霸凌行為應負之法律責任。2011年8月16日，取自 <http://140.111.1.88/law/>
- 教育部統計處（2011）。教育部九十九年各級學校校園事件統計分析報告。2011年7月25日，取自 [http://140.111.34.54/statistics/publication.aspx?publication\\_sn=1734&pages=0](http://140.111.34.54/statistics/publication.aspx?publication_sn=1734&pages=0)
- 陳利銘、鄭英耀、黃正鵠（2010）。反霸凌政策之分析與改進建議。教育政策論壇，13（3），1-25。
- 陳怡儒、鄭瑞隆、陳慈幸（2010）。少年網路霸凌被害因素研究——以日常活動被害理論分析。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2（2），101-139。
- 陳毓文（1999）。論少年暴力行為與暴力環境之相關性。臺大社會工作學刊，1，1-33。
- 馮韻文（譯）（2008）。E. Durkheim著。自殺論：社會學研究（Le Suicide: etude de sociologie）。臺北：五南。
- 黃振賢（2011）。國小學生班級同儕關係與霸凌行為相關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學視導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
- 黃瑞祺（1996）。批判社會學：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臺北：三民。
- 楊思偉、陳盛賢、江志正（2008）。日本教師教育改革之研究。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4（1），27-54。
- 楊深坑（1997）。溝通理性·生命情懷與教育過程——哈伯瑪斯的溝通理性與教育。臺北：師大書苑。
- 葉啓政（2000）。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與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論述對

- 話。臺北：三民。
- 翟本瑞（2002）。閱讀傅柯與傅柯式閱讀。載於蘇峰山（主編）：**權力、意識與教育：教育社會學理論導讀**（頁147-188）。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 歐用生（2007）。日本新自由主義與教育改革。**教育資料集刊**，36，79-100。
- 蔡文輝（2000）。**社會學**。臺北：三民。
- 盧名瑩、董旭英（2010）。臺灣都市區域國中生的金錢態度與偏差行為之關聯性研究。**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2（2），21-62。
- 譙淑婷（2012）。網路霸凌延燒 從教育、立法導正。2012年2月14日，取自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77153](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77153)
- 顏正芳（2010）。兒童青少年校園霸凌經驗和心理健康之關聯性。**臺灣精神醫學**，24，3-13。
- 羅印冲、郭安家（2010，12月22日）。教長挨批 火燒屁股才處理。**聯合報**，A3版。
- 譚光鼎（2010）。**教育社會學**。臺北：學富。
- 嚴文廷（2010，12月21日）。學校吃案 警方也吃案 匪夷所思。**聯合晚報**，A3版。
- Blumer, H. (1962).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orovoy, A. (2008). Japan's hidden youths: Mainstreaming the emotionally distressed in Japan. *Culture, Medicine & Psychiatry*, 32(4), 552-576.
- Bourdieu, P. (1990) Structures, habitus, practices. In P. Bourdieu (Ed.), *The logic of practice* (pp. 52-7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rkheim, E. (1961). *Moral education*. New York: Free.
- Elliott, A. (Ed.). (2010).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Eslea, M., Menesini, E., Morita, Y., O'Moore, M., Mora-Merchán, J. A., Pereira, B., & Smith, P. K. (2004). Friendship and loneliness among bullies and victims:

- Data from seven countries. *Aggressive Behavior*, 30(1), 71-83.
-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S. Ala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3)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1996).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ens, A., Duneier, M., Applebaum, R. P., & Carr, D. (2009).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7th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Hara, H. (2002). Justifications for bullying among Japanese schoolchildre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3), 197-204.
- Jacobson, R. B. (2010). On bullshit and bullying: Taking seriously those we educate.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39(4), 437-448.
- Kanetsuna, T., & Smith, P. K. (2006). Coping with bullying at school: Children's recommended strategies and attitudes to school-based interventions in England and Japan. *Aggressive Behavior*, 32(6), 570-580.
- Manning, P., & Smith, G. (2010).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In A. Elliott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pp. 37-5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I). London: Penguin.
-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Responding to problem behavior and non-attendance at school*. Retrieved August 5, 2011, from <http://www.mext.go.jp/english/elsec/1303529.htm>
- Morita, Y., Soeda, H., Soeda, K., & Taki, M. (1999). Japan. In P. K. Smith, Y. Morita, J. Junger-Tas, D. Olweus, R. Catalano, & P. T. Slee (Eds.), *The nature of school bullying: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pp. 309-32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ouzelis, N. (1991). *Back to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s*.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 Naito, T., & Gielen, U. P. (2005). Bullying and ijime in Japanese schools: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In F. L. Denmark, H. H. Krauss, R. W. Wesner, E. Midlarsky, & U. P. Gielen (Eds.), *Violence in schools: Cross-n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pp. 169-190). Retrieved August 5, 2011, from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k26t428781176822/doi:10.1007/0-387-28811-2\\_9](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k26t428781176822/doi:10.1007/0-387-28811-2_9)
- Ogbu, J. U., & Fordham, S. (1986). Black students' school success: Coping with the "burden of 'acting White.'" *The Urban Review*, 18(3), 177-206.
- Olweus, D. (2001). Peer harassment: A critical analysis and some important issues. In J. Juvonen & S. Graham (Eds.), *Peer harassment in school: The plight of the vulnerable and victimized* (pp. 3-20). New York: Guilford.
- Ozawa-de, S. C. (2008). Too lonely to die alone: Internet suicide pacts and existential suffering in Japan. *Culture, Medicine & Psychiatry*, 32(4), 516-551.
- Pollard, A. (1982). A model of coping strateg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1), 19-37.
- Ray, L. (2010). Classical social theory. In A. Elliott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pp.19-3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Rigby, K. (1996). *Bullying in school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 Salmivalli, C., Lagerspetz, K., Björkqvist, K., Österman, K., & Kaukiainen, A. (1996). Bullying as a group process: Participant role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social status within the group. *Aggressive Behavior*, 22, 1-15.
- Shimizu, H. (2000). Beyond individualism and sociocentrism: An ont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opposing elements in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Japanese adolescents. *Human Development (0018716X)*, 43(4/5), 195-211.
- The Japan Times Online (2006). *Bullying still a school problem*. Retrieved August 5, 2011, from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ed20061028a1.html>

- The Japan Times Online (2007a). *Ministry admits bullying behind 14 suicides*. Retrieved August 5, 2011, from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nn20070120a9.html>
- The Japan Times Online (2007b). *The reality of bullying*. Retrieved August 5, 2011, from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ed20071206a2.html>
- The Japan Times Online (2007c). *Unhappy state of education*. Retrieved August 5, 2011, from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 eo20070118hc .html>
- The Japan Times Online (2009). *80% of kids either bullies, victim*. Retrieved August 5, 2011, from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 bin/nn20090627a5.html>
- The Japan Times Online (2010a). *Looking back at 'Japan as No. 1'*. Retrieved August 5, 2011, from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nn20101111f1.html>
- The Japan Times Online (2010b). *Suicide of girl, 14, laid to bullying*. Retrieved August 5, 2011, from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nn20100304a5.html>
- The Japan Times Online (2010c). *Suicide prompts major bullying study*. Retrieved August 5, 2011, from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nn20101111a6.html>
-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